■新作聚焦

何建明报告文学《商的芭蕾：广东外贸史诗》：在商贸叙事里看见时代力量

□张 陵

《商的芭蕾：广东外贸史诗》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反映了中国对外商贸的漫长历史与奋斗现实，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拥抱世界的故事。作品精准抓住时代主要矛盾，传递出丰富的时代信息，表现了中国劳动者坚定的民族立场、高质量发展商品经济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信心，成就了一部激动人心的“商贸史诗”



《商的芭蕾：广东外贸史诗》，何建明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26年8月

给世界一片“确定性”的绿洲

何建明近年的每一部作品，书写的都是伟大时代的史诗。完成《浦东史诗》《如诗的大地》以后，他推出长篇报告文学《商的芭蕾：广东外贸史诗》（后文简称《商的芭蕾》），这三部作品共同构成了致敬伟大时代、迎接中国改革开放50周年的史诗性“三部曲”。这三部作品都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演进的历史方位，以作家的如椽巨笔，反映中国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其中，《商的芭蕾》作为今年APEC“中国年”的献礼之作，最具题材的开拓意义。作品集中反映中国对外商贸的漫长历史与奋斗现实，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拥抱世界的故事，题材厚重、视角新颖，巧妙而精准地写出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活力与创新智慧。

当今世界局势剧烈动荡，为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与危机。中国以高质量发展给世界带来希望和信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成为一片“确定性”的绿洲。在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选择广东对外商贸题材，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政治判断力、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表现能力。何建明长期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线，依靠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跟着时代发展的节奏读解社会、读解中国，读解世界，形成了独有的社会思想和创作思想。这一次，他用自己的脚步再次丈量珠江三角洲这片熟悉的热土，有了独特的感悟：“当你的心灵贴近大地，将情感融入一片天地，又用双脚脚踏实地地丈量那个地方时，便会豁然领悟许多奇妙之事。”透过广东对外商贸战线不断开拓奋进的历程，我们不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读懂广东人的创造密码，也看到了能够给世界提供最大确定性的力量所在。

《商的芭蕾》的主题立意带着鲜明的问题导向，精准抓住时代主要矛盾，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内涵，传递出丰富的时代信息，表现了中国商贸从业者坚定的民族立场、推动商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意志和不可动摇的信心；有力揭示出，中国几十年奋进意志坚定、目标明确，通过自身和平发展，早已积累了丰足厚实的“确定性”。作品中那些普通平凡的广东人，为生计辛勤奔波，把中国商品送到世界，又把世界商品运回中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不知不觉中创造着中国价值、积累着中国力量。同时，也展现出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勇于挺身而出、主动作为，为世界和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确定性、安全感和创造力。

继往开来，广东商贸的千年传奇

何建明的创作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理念，将广东商贸对世界的贡献，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广东商贸的智慧和文化性格，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南珠、沉香、丝绸、陶瓷等大批中国商品经由海路远销异域。流传于岭南的广东航海探险者“水生”“靓妹”的故事，并非只是先民口头的传说，在作者的考证之下，它有着真实的历史支撑。作品从南越王墓的考古发掘成果里，描写了当年社会财富的丰足、商品生产的发达以及商品经济的活跃，由此迎来了第一个对外商贸的“黄金时代”。当然，为之付出的代价很难想象。常常是出发时30多条船百人之众，回来时只剩下“三叶破舟”，20多人。大量船只和大批水手，都葬身大海。作品缅怀广东先民的伟大牺牲后，评价道：“这是用血染出的银光金彩的海上商贸之路。”

广东对外商贸的又一个繁荣期，公认是“十三行”行商们共同开创的。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群体，当时分为盐商、米商、粮商、铁商、茶商、布商、药商、烟草商、丝绸商、陶瓷商、典当商等十几个商业行业，统称“十三行”。“因为它是18世纪中叶世界最繁荣且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贸易市场，更是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心目中满怀迷恋与向往的‘广州时代’的发源地”，其带来的经济繁荣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由茶叶贸易引发的贸易争端与后续战争冲突，虽让清帝国延续旧秩序的幻梦破碎，却也激活了中国仁人志士的热情与思想，促使他们萌生摆脱国家积贫积弱的思考，最终汇入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潮流。对外商贸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作家以独到的目光记录了中国茶叶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相遇，成就了一段中国商贸的传奇。书中借茶叶专家刘峻周与列宁交往这段往事表明：近现代中国商贸不光输送商品，而且传递先进思想、进步文化，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改革开放近50年，确立并巩固了大湾区重要城市“千年商都”的国际地位，塑造了广东对外商贸的世界形象。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广东人民充分发挥自己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区位优势，以历史积淀下来的特有的经济敏感和市场嗅觉，精准捕捉到一个新的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到来的信息，勇敢地放下历史包袱，解放思想，坚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率先打开对外商贸之门，冲向国际商品贸易市场。从《商的芭蕾》讲述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最初走进世界市场的中国商品，更多来自传统产业，是一张纸、一炷香、一把刀、一瓶酱油、一只手袋、一罐茶叶等日常用品。它们看似无法与当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机竞争，然而曾几何时，这些产品便惠及全球家庭，赢得各国消费者的信任和欢迎。中国商品抓住了自己独有的历史机遇，开拓出自己的国际市场。历史证明，勤劳智慧的广东实业家和贸易家们一旦打入国际市场、掌握国际贸易规律，就会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加快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步伐。

《商的芭蕾》放得开，收得住。何建明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寻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让我们看到商贸精神如何在广东人向海外求生存的斗争中融进一代代人的血脉，创造一个个商贸奇迹，成就了一部激动人心的“商贸史诗”。

商贸之道里的东方智慧

回望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动，部分西方国家的对外市场开拓，依托武力威慑、殖民统治构建起不平等的贸易秩序。而中国自古至今把自己的商品卖给别人，靠的是公平交易、信誉、尊重、耐心和定力。用《商的芭蕾》里一句最朴素准确的话，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行商准则和道德圣经，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作家眼中，广东老字号“李锦记”就是一个忠实践行商贸信条的典型。1888年，“李锦记”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蚝油作坊，创始人李锦裳出身寒微，为人厚道良善，做生意讲公平诚信。他看到乡里乡亲喜欢他生产的调味品，就更加用心保证质量。老百姓不富裕，他就赊账，到了年底，再把剩下的账单烧掉，不让乡亲背债过年。后人李兆南秉承这个优良传统，并把这种厚道之心融进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完成了从“地方作坊”到“出口商”的蜕变，生意越做越火。百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李锦记”已经建成了“酱料王国”，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阳江民用刀具，也经过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才成为受到海内外欢迎的商业品牌。《商的芭蕾》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商业的根本是民生，是人心。服务民生，获得人心，买卖才能长长久久。

由商贸之道引申到发展智慧，作品没有作详细的理论探讨，却也以讲故事的方式涉及了几个重要方面。商贸之道中的“五湖四海”便是其中之一。广东商贸向国际市场的开拓，得益于在那里扎根的几代华侨，特别是广东籍华侨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都盼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以后，家乡人的日子好起来。他们就是广东商贸的“五湖四海”，在祖国和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为广东商贸开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这份情感和贡献，在《商的芭蕾》中展开得较为充分。广东华侨的四大百货撑起了上海南京路的现代商业格局。港商张子弥在华润公司帮助下，得风气之先，在东莞建立太平手袋厂，迈出了“世界工厂”的第一步。“世界毛纺大王”曹光彪在改革开放之初到广东投资740多万港元建造了“珠海市香洲毛纺厂”。在江门、中山、潮汕、阳江等岭南地区，海外华侨纷纷回乡投资。某种意义上，广东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局面是由华侨们撑起来的。中国能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海外华侨、华人的助力，不可低估。“五湖四海”历史性的贡献，构成了广东对外商贸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商品撬动大市场，《商的芭蕾》还讲到典型的东方思维“以小博大”在广东对外商贸领域的应用。有着“中国纸巾大王”之称的邓颖忠原先主要做水泥袋，看到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的纸巾市场一直由国外品牌控制，决心生产中国自己的纸巾。这场号称“一张纸”的战争持续了二三十年，以本土品牌占据中国市场的主要份额而告终。沉香和陈皮都是经典的“广货”，被称为“中国香”，香飘国际市场，产品不大，却站稳了脚跟，做成了大生意。这样的故事太多，作为细节贯穿于广东商贸的历史进程中。何建明深刻认识到：“这种‘以小见大’的逻辑，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商业贸易中屡屡击败对手的重要法宝。”

特立独行的舞者，舞出商贸史诗之魂

报告文学的基本手段就是讲故事，写人物。《商的芭蕾》的每一个故事都娓娓动听，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世界在，故事就在。所以，作家只能行走在大地上，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写到哪里。也许有限，却能抓住商贸史诗之魂。

创业的故事最具传奇性。1978年9月，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外向型企业在东莞落地投产，港商张子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撬动了中国东莞“世界工厂”的起步进程，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经济传奇。香港企业家胡应湘最早提出港珠澳大桥构想，为联动打通港珠澳三地经济发展长期奔走呼吁，倾注半生心血，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形成贡献了重要思路。以任正非、董明珠、王传福等为领军人物的广东先进制造企业，都得到了作家浓墨重彩的描写。透过他们，《商的芭蕾》塑造了广东对外商贸的主角们的群像。与此同时，腾讯、三七互娱、唯品会，以及“拓斯达”“优必选”等中国机器人品牌也得到作者的高度评价。新一代的头部科技实业、现代服务业等正值青春，这份新质生产力的名单向我们展示，智能化、数字化时代的新制造、新商业、新模式，已经成为广东商贸史诗的新时代续写者。何建明用“芭蕾”来比喻“东方贸易的唯美之道和高贵品质”，很有诗意，给人以想象。其实，“商的芭蕾”的内涵也可能很单纯。传统文化“重农轻商”，历史却铸就了广东独特的文化性格——重农也重商。尊重传统，也不断创新。我们注意到，封面上的舞者是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也许，作家想告诉我们的是，以新一代机器人为代表产品，广东人正在舞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样态，而世界对中国式舞步也越来越着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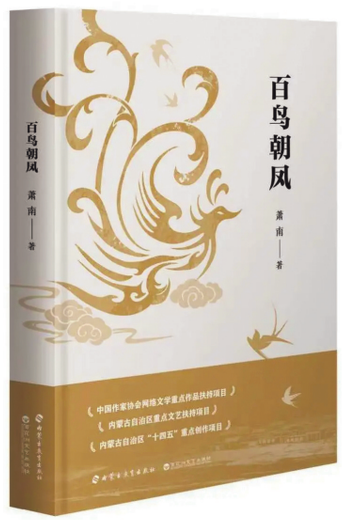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评 论

于历史的回响中书写新生

——评萧南长篇小说《百鸟朝凤》

□陈定家



《百鸟朝凤》，萧南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6年6月

长篇小说《百鸟朝凤》以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上的水塘村为叙事原点，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为时代背景，构建了一幅北方山村的变迁图景。小说分为“鸿鹄志”“杜鹃血”“青鸟梦”“朱雀魂”四部分，以返乡大学生、驻村干部、残疾女性、革命老人四种视角展开叙事，形成了一种复调式的表达结构。从叙事策略、历史意识、人物塑造三个方面，可以读出这部作品如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表达。

《百鸟朝凤》突破了单一视角的乡村叙事模式，设置了四个不同的叙述主体，各自带着不同的生命经验与观察视角，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的乡村认知网络。

返乡大学生罗旭的视角，既带着对贫困家庭的创伤记忆，又怀有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既对土地存有深切的眷恋，又渴望挣脱土地的束缚飞向更广阔的世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驻村干部刘奋勇。他的叙事透露着一个中年基层干部的疲惫与困惑：职场失意、身体透支、理想受挫。初到水塘村时，他怀抱的是一种近乎逃避的心态。安昶的出现改变了他——那个在扶贫路上牺牲的前任，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刘奋勇这条线索呈现了扶贫工作者的精神蜕变过程，让读者看到宏大政策背后那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如何被理想点燃，又如何将理想传递下去。

郭凤的视角是这部小说最具原创性的设置。一个因小儿麻痹而行动受限的年轻女性，她的身体被困在残疾的躯壳中，目光却成为村庄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她观察四季轮转、人事代谢，也观察政策的落地、产业的兴起、生活的改善。当驻村工作队帮助她发展电商销售马铃薯时，她就成了乡村变革的亲历者。这一视角提醒我们：乡村振兴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是每一个具体生命获得尊严与可能性的过程。赵国忠的目光则将当下与历史连接起来。作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党员，他的记忆里储存着这片土地最惨烈也最光荣的过往。他经常“看到”牺牲的战友来与他唠嗑，这使小说的历史维度获得了具象化的呈现。老人用一生的长度来丈量时代的变迁，他见证的乡村巨变因此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四种目光在叙事中相互交织。罗旭的父亲罗卫国，恰恰是刘奋勇和安昶帮扶转化的对象；郭凤的电商事业，与蓝雨桐的民宿产业共同构成了水塘村的新业态；赵国忠的记忆，则为所有当下的努力提供了历史参照。这种多视角的叙事策略，使《百鸟朝凤》超越了单一主角成长小说的格局，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内涵。

《百鸟朝凤》的另一个独特贡献，在于它将乡村振兴这一当下命题放置在深远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观照。小说中大量穿插的历史记忆，是构成作品精神质地的重要材料。

祖父罗永恒的经历，是贯穿全书的一条历史暗线。他八岁时被日军抓去喂马，在田家镇惨案中目睹日寇对手无寸铁百姓的屠戮，后来被土匪所救，又在解放战争中历经生死，最终分到土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农民。这条生命轨迹浓缩了中国农民从任人宰割到当家作主的历史进程。当小说在结尾处呈现水塘村的新貌时，读者会自然地将眼前的安宁与当年的血火相对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分量。

小说对饥荒记忆的书写同样值得关注。关和子在客车上讲述祖辈“走西口”的经历，丁戊奇荒中饿殍遍野的惨状，饥民“易子而食”的极端困境，这些叙述建构了一个农业文明与自然灾害漫长抗争的历史图景。只有记住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苦难，才能真正理解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的文明意义。

《百鸟朝凤》书写历史的方式不是线性的编年史式的叙述，而是将历史碎片化地镶嵌在当下叙事之中。罗旭从车窗看到远山上的汉代烽燧和明代长城遗址，听到秦二先生讲述晋公子重耳“乞食于野人”的典故，在永兴镇豆腐坊里听到人们对田家镇惨案的追忆——历史就这样散落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成为这片土地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历史叙事的冗长乏味，也让历史获得了与当下对话的活力。

从关和子祖上为躲避饥荒走西口，到当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本质上都是在“离开土地”中寻求生机。而水塘村的乡村振兴实践——发展温泉旅游、打造田园综合体、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则在探索一条“不离乡土而能致富”的新路。蓝雨桐的“云朵嘎查”民宿吸引了京津冀的游客，郭凤的马铃薯通过电商销往各地，这让乡村不再只是被“离开”的地方，而成为可以“回来”的地方。小说对历史记忆的反复书写，是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农民是否必须离开土地才能获得幸福？乡村振兴正是对这一历史困境的当代回应。

《百鸟朝凤》中打动人心的力量来源于它对普通人的深切注视。小说没有回避家暴场景的残酷描写，拒绝任何美化，同时也展示了罗卫国转变的过程——安昶用“拼酒”敲开他的心门，几宿彻夜长谈让他决心戒酒，最终他搞起养殖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一人物弧线并非要为家暴者开脱，而是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可塑性。罗旭最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原谅与否，而是如何接纳一个“不完美但已改变”的父亲。

秦二先生是另一种乡村知识分子的缩影。他熟读《周易》《论语》，写得一手好字，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剥夺高考资格，一生困守乡村。他坚守着村小的讲台，给17个留守儿童教书。他对罗旭说“要立大志，成大器”，用自己失败的人生经验为年轻人的选择提供参照。他的身上有一种古典文人的悲剧气质，但更多的是底层知识分子不甘沉沦的倔强。他对乡村教育的坚守，构成了水塘村精神层面的一道精神脊梁。

高栓柱少年时是霸凌罗旭的“小霸王”，父亲在采石场意外身亡后被迫辍学，后来在工地失去一条腿，妻子离家出走，独自抚养女儿。当罗旭回村时，高栓柱拄着双拐来见他。这个人物身上凝聚着普通农民面对命运打击时的韧性，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扶贫政策如何托住了社会最脆弱的群体。

《百鸟朝凤》试图回答的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从作品最终的呈现来看，这个抱负已经落地生根。在风雪中的客车、豆腐坊里的闲谈、新修的水泥路、现代化的温室大棚之间，一个古老村庄的当代故事正在展开。罗旭、刘奋勇、郭凤、赵国忠这些人物，就像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飞翔的不同鸟类，他们振翅的声音，共同汇成了这片土地上空最动人的回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